

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起源、内涵与 精神体现的差异性分析

徐春捷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哈尔滨 150040)

提 要: 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现象, 在文学中通过作者自我塑造和社会反映, 带有对人与宇宙、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思考性。本文首先比较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内涵, 然后通过分析作品重点比较人文精神表现的差异性, 包括群体性的“仁者爱人”与个体性的自我批判、天人合一与人神对立以及民生与民权等。研究发现, 中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不管源起于何时, 都关注和思考人本身; 人文精神的重点在于思考人本和民本。但是, 因为中西方文化基础不同, 所以体现在文学中的人文性有差异, 如中国文学中的人学更加重视群体性的仁者爱人, 而西方则很早就开始兴起自我批判。

关键词: 中西方文学; 人文精神; 人文复归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2-0150-4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2.029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and the Differences of Spirit Embodi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Xu Chun-ji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150040, China)

The humanistic spirit is humanity's common spiritual phenomenon. It formed i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author's self and social reflection. It is thought-provoking about man, universe, na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mpare the origin and connota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en i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cluding Benevolence in Confucius ethics and the self-criticism of individuality,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eople against God,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civil rights. It is found out that regardless of origins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humanistic spirits have a concern for man himself. The key to humanistic spirit is in human-oriented and people-oriented concept.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e humanism embodied in literature is quite different. For instance, the Chinese literature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love for others, while the Western literature cherishes self-criticism.

Key words: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ture; humanistic spirit; humanistic return

1 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内涵的比较

1.1 起源

西方人文精神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但在古希腊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出其端倪。古希腊文学已经表现生命意志和情欲,并有了自由观念以及主体精神的最初体现,对宇宙、自然和人生有深层思考。在古希腊神话中,神的意志与人的意志相融合“神就是人自己”,所以古希腊人通过对神和英雄的行为模式“隐喻自身的原始欲望和潜在冲动”,这充分体现个体文化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李建

明 谢锡龄 2010: 34-35)。

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则来源于五四运动时期。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封建残留势力企图恢复封建权威,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尊孔复古活动等。为彻底瓦解这股封建逆流权势,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民主主义代表发起新文化运动,向封建思想、宗教迷信和专制统治发起猛烈攻击。“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辜鸿铭等利用他们汲取的西方现代文化知识,在文化、教育阵地向陈腐的封建旧文化发出挑战。”(南帆 2011: 21-22) 他

们总结清朝以来历次社会变革中的经验教训,认为中国要走上富民强国的道路,必须在精神文化层面注重人的天性,重视人的启蒙以及促进人的觉醒。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五四时期的很多文学作品基本上都以促进“人的觉醒”为己任,从而具备“人的文学”的基本特征。但是,这样的“人的觉醒”并不是彻底的觉醒。由于外界环境的束缚,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更多的像是在一个苦闷的“铁房子”里开了一条缝隙,透了一点气,使人看到希望。换言之,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相关作品更多具有启蒙性质。

1.2 内涵

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涵盖范围非常广,不仅指人的能动作用、人的主观意志等,而是将其内涵扩散到对人的关注,重视和凸显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先驱但丁就在其《神曲》创作中歌颂人的自由、理性和求知欲望,具有鲜明的时代人文精神。(德沃尔珀斯 2013: 56-57) 这表现出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更加关注理性,强调人的超越。作品或是弘扬人性,或是批判现实社会政治权势,通过正反两方面表达时代的文学使命。(贺佳 2010: 123-124)

而中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内涵常常体现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走出蒙昧,以构建以人之生存为中心的良知、法律、道德、信仰、理想诸方面的人文价值体系。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好学生谢慧敏与坏孩子宋宝琦之间的差异是那么明显,然而在她与他均把《牛虻》当作“黄书”这一盲点上,表明二者都蒙昧。班主任张俊石老师引导他们阅读中外优秀文学书籍,实际上反映出已经开始的文化启蒙。颇有象征意味的是,张俊石作为优秀教师形象处于作品的中心地位,恰好表现当时人文知识分子在启蒙潮流中的重要性。(颜敏 2007: 23-24) 《班主任》不仅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之作,而且是开始第一个启蒙潮的标志。这场启蒙潮的历史功绩在于,手执批判武器首先扫荡长期思想禁锢与瞒和骗的文学妖氛,将文学与民族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连接起来,打破个人迷信与造神运动的蒙昧。中国文学中的人文主义还对历史的发展有深刻思考,如王蒙《蝴蝶》的主人公张思远。当他平反复出,担任国务院一位副部长之后,对历史有这样一段思考:“1949年的腰鼓,1976年的游行,在小石头、张指导员、张书记、老张头和张副部长之间,分明有一种联系,有一座充满光荣和陷阱的桥。这桥是存在的,这桥是生死攸关的”。显然,这是作家从开国到粉碎“四人帮”,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寻找如何填平陷阱、发扬光荣历史的途径。”又如李国文的《月食》,小说篇名即象征十年动乱以及“五七”灾祸如同“月食”。悲剧历史结束后,那摆脱黑影重放光彩的月亮将更加明净、更加高洁。可见,第一次启蒙思潮的文学打破历史坚冰,勇往直前,但它的脚步没有追寻人的生存危机,而依然踟蹰

于政治层面。

2 人文精神表现的差异性

2.1 群体性的仁者爱人与个体性的自我批判

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更加追求启蒙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在表面话语表述的一致性。无论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还是戴厚英的《人啊,人》,或者是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他们都标志着一个共同的声音——人要觉醒的呐喊。如在《人啊,人》中,孙悦曾经将世俗神灵的意志作为自己意志的指引,扼杀自己的感性生命,扭曲自己的个性,放弃个人的主体意识。但是,惨痛的命运终于使其发现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与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自甘堕落、驯服的工具”(戴厚英 2002: 105-106)。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文学的形式进行一次非文学的抗议,主要还是为了表达群体性的对人性的爱,人自身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丰富性促进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深化。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侧重人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主流意识形态则认为在革命的异化下,也有对人的尊重。即便是二者在态度的同一性下面有争论,起码也表明一个基本的现实——人之为人,重新回归到文学创作的中心。(Delfabbro, et al. 2006: 234-235) 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不仅仅关注个人的命运,更多的是整个社会及其生活的改变。如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悲剧中借主人公哈姆雷特之口赞美人类,“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雅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 2015: 23-24)。

但莎士比亚与早期人文主义者不同,他不绝对和简单地赞美人性,因为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人性的复杂性。所以,哈姆雷特话锋一转,“可是在我看来,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人类不能使我发生兴趣: 不,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同上) 在哈姆雷特的同一段话里,赞美人类代表莎士比亚对人性的乐观态度,而无法使其发生兴趣的论断则代表他对人性的悲观意识。

2.2 天人合一与人神对立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程度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由天及人,从效法以仁生物的精神出发,提出以仁为人之本,以仁为人间道德基石的思想。中国文学偏重的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崇高精神境界,也是个人人生境界的最高体现,其核心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体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实践是个人的,这一方面意味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正是这种选择决定个人成为什么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人要对自己的

行为负责,即个人不能不面对超个人的普遍原则,实践的个别性不能理解为实践原则和意义的任意性。(孟志明 2014: 57-58) 如汪曾祺的作品:关于人性以及人道主义,并没有卢梭式的口号,也没有对国民的大声疾呼,只是在作品中朴实而深切地将自己对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的看法流露出来。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坦言,其写《受戒》的目的无非说明认识不能被压抑,应该发掘人身上美好而诗意的“移民”,要肯定人的价值,寻求人的解放。从“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到“世俗的人道主义”,似乎无论按照哪个称谓推断,都必然会在人道主义的社会性上深深地烙印上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制度的印记。但是,汪曾祺的作品只是顺其自然地让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自身的本性,自由自在,而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干扰与束缚,既不运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也不从大环境、大形势着眼,只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以及命运,只是在乎人的性格、个性、特点以及操行。也许有评论家将汪曾祺的作品归于乡土或者市井流派,但这些都无法抹杀汪曾祺透过这些传统的人物、面孔以及风俗等表象,赞美、弘扬人的精神面貌以及人对美好的向往,所以其作品中的人文主义理念带有天人合一的味道。

而在西方文学中,人文主义精神却体现在人神对立上。如神话故事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行动,敢于违抗天帝宙斯的意志,有很强的叛逆精神、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在索福克勒斯的7部著作中,《俄狄普斯王》被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作品,主人公俄狄普斯勇于反抗悲剧性命运的行为也正是对这种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最好诠释。(Rimmon-Kenan 1983: 135) 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想伴随文艺复兴而诞生,也是后来欧洲启蒙运动的旗帜。其主要观点在于人、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它关注人与信仰、人与自然以及人的尊严与自由意志,强调个人价值与民主。从哲学层面看,人文主义即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Propp 1968: 3-5) 如在莎士比亚的《奥瑟罗》中,男主人公的挣扎像锋利的锥子,反复戳进他结实的皮肉,一个盖世英雄就这样被谗言摧毁。而这情节的底色实际上是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人文主义者面临的自身局限和邪恶势力的进攻,这是客观存在的人的复杂性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正是人文主义的深刻体现。

2.3 民生与民权

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主体”曾经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主体观念从哲学领域跨入文学,刘再复居功至伟。他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与《论文学的主体性》在20世纪80年代名重一时。那时我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并非以理性、公正和犀利的批判锋芒著称。对于他们来说,气宇轩昂的五四知识分子恍如隔世,西绪福斯式的倔强或者尼采式的“超人”凤毛麟角。从谶容的《人到中

年》、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王蒙的《布礼》和《蝴蝶》,知识分子多半以受难者的形象出场。贬抑、讥讽、漫长的思想改造和无情的政治攻击蚀去一切桀敖不驯的棱角。跨入80年代,短暂的控诉和伤感之后,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愿是尽量弥补遭受荒废的事业。然而,这种无怨无悔的“孺子牛”形象并未维持太久。(Culler 1975: 45-46) 或许,这是一个未曾充分阐释的问题:90年代后,哪些原因驱使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发生彻底改变。不论是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洱的《午后的诗学》还是阎连科的《风雅颂》,都在凸显知识分子迅速沦为名利的俘虏。在追名逐利的日子里,满腹的诗书无非转换成别致的欲望修辞学。这种气氛甚至孕育出另一个90年代的张贤亮。在他那里,80年代的受难者如同阳光下的雪人溶化在欲望与市场氛围中。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受难者的全部历史成功地兑换为境外性冒险的资本;到了《青春期》,那些人们熟悉的章永璘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当年的马缨花、海喜喜一群底层人物扮演企图蚕食企业的周边刁民。知识分子的文学形象开始变质,这可以视为主体分裂的前期征兆。(王楠 王小琳 2011: 45-46) 而西方文学人文精神更多体现在一种普适性的民权立场上,诚如本哈德·施林克所言,“人并不因为曾做了罪恶的事而完全是一个魔鬼,或被贬为魔鬼”(Morgan, Mutoko, Bartholomeus 2014: 45-46)。人性总有晦暗的一面,人也总有失意之时,人会犯错,因为人非圣贤,这就是人性。与新时期的处理方式相比,新时期之后的小说还是愿意给予这些浪子回头的机会。如《辛德勒名单》中辛德勒这个典型人物:吃喝玩乐、情人无数,打算利用二战大发横财,却因为次次目睹犹太人的惨遭杀害而良心觉醒,他的工厂因此全部雇佣犹太人,使1100名犹太人幸免于难。在这个过程中,同样体现对人性甚至跨越种族人性的相同理解。普世的同情是人道主义的基础,也是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基本命题。

2.4 欲望的抗争与自由的推崇

中国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表现在人对欲望的抗争上。如在《妻妾成群》中,颂莲是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这种教育背景以及其所接受的陈腐命运,必然扭曲她的人性。在陈府里,她要与大太太毓如斗,同二太太卓云斗,同三太太梅珊斗,甚至还需要与小丫头雁儿斗,斗得不遗余力。四面受敌的颂莲知道,自己要想改变命运无非母凭子贵一途。她的人性在这一刻被扭曲——生儿育女这一天然的人的本能被异化为一种争斗工具。而另颂莲没有想到的是陈佐千早就在过度的纵欲之后,没有生育能力。在洞察陈府的一切后,她了然大太太无能只有空洞的权威,知道二太太的口蜜腹剑,也发现三太太与医生的奸情。而后,她决定要在这场后院的争夺中屹立不倒。但是,她没有想到在这场争宠的战斗中,自己已经

一步步丢掉人格的独立与自尊,最终沦落为一个酒后大喊“老爷今晚陪陪我,我没人疼,老爷疼疼我吧!老爷别走……”的可怜女人。而最终陈佐千“疼你还不如疼条狗”(鲍红新 2009: 45 - 46)的话以及被沉井的梅姗为颂莲的悲惨一生画下注脚。笔者认为,这种叙述有深层的隐喻:人性的完整在于人格的独立。离开社会背景谈人性,无趣而空洞;离开人性谈社会,也无意义。颂莲、梅姗们的悲剧实际上是人性与社会背景交叉的产物。她们是人,因为有自己的欲望和诉求,所以就有不可避免的矛盾。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们欲望的实现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她们无法认识到彼此都受压迫,如同一跟藤上的苦瓜,斗得越多,苦难就会越多。而所谓的人性或者人道,在不同社会背景下,自然有不同的解读。(秦风云 2013: 123 - 124)而西方文学更加偏重追求自由,集中体现它的人道主义传统;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共性,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不提倡“阶级分析”,不提倡“人与人斗”(Perrine 1974: 44),主张自由竞争。文学艺术主要抒发个人情感,肯定个人主义的人格价值。

3 结束语

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现象,并在文学创作和作家的自我人格塑造中得到体现。由于中西社会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人文精神在中西文学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特点。研究发现,中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不管源起于何时,都关注和思考人本身。但是,中西方因为文化基础不同,所以体现在文学中的人文性也具有差异。如中国文学中的人学更加重视群体性的仁者爱人,而西方文学则很早就兴起自我批判。中国文学人文主义受到儒释道影响,体现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西方文学则受到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影响,凸显人神对立。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探索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陈虹 2006: 67 - 68)作为人学的文学,为人的生存意义上下求索。

参考文献

鲍红新. “女性”与“历史”: 两个批评关键词——重读《妻妾成群》[J]. 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4).

定稿日期: 2016 - 01 - 10

- 戴厚英. 人啊,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 德沃尔珀斯. 母题的分配、修饰及其与情境的区别文学母题的重新认识与分类之三 [J]. 大连大学学报, 2013(2).
- 陈虹. 存在“何”在: 昆德拉小说中的时间之思 [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4).
- 贺佳. 海上的奥德修斯论“航海冒险”母题的演绎及成因 [J]. 西安社会科学, 2010(2).
- 李建明. 谢锡龄.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J]. 社会科学家, 2010(3).
- 孟志明. 谈英美文学的人文精神 [J]. 芒种, 2014(6).
- 南帆. 八十年代: 话语场域与叙事的转换 [J]. 文学评论, 2011(3).
- 秦风云. 论西方文学中人文主义的发展 [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1).
- 莎士比亚. 莎翁戏剧经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王楠. 王小琳.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Etiquette Culture [J]. 大众文艺, 2011(11).
- 颜敏. 从刘心武红学热看当前的文学与文学研究 [J]. 当代文坛, 2007(1).
- Culler, J. *Structurist Poetics* [M]. London: Routledge, 1975.
- Delfabbro, P., Winefield, T., Trainor, S., Dollard, M., Anderson, S., Metzger, J., et al. Peer and Teacher Bullying/Victimization of South Australi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Prevalence and Psychosocial Profiles [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6(76).
- Perrine, L. *Story and Structure* [M]. New York: Harcourt Press, 1974.
- Morgan, C., Mutoko, L. H., Bartholomeus, H. Integrated Analysis of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ir Impacts on Agrarian Livelihoods in the Western Highlands of Kenya [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14(12).
- Propp, V.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68.
- Rimmon-Kenan, S. *Narrative Fiction* [M]. London: Methuen, 1983.

【责任编辑 王松鹤】